

论家文化的传统底色与现代演变

夏 雪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家”始终是社会结构基础与文化传承核心。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而言，家文化不仅是亲属网络，更是具本体论意义的生存体验、严密伦理规范及联结个人、社会与国家的政治哲学。探究其历史渊源与现代演变，对理解当代教育根基具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百年间，随现代化剧烈冲击、人口变动及全球化加速，传统家文化亟需面向时代解构与重塑。现代社会结构对传统家庭结构与生育制度提出严峻挑战。同时，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均在重新审视并唤醒家庭的社会价值，试图通过政策干预重建支持体系。本文旨在梳理家文化的儒家渊源，论述其在当代中国与全球政策中的意义，剖析其内涵外延，并直面现代社会挑战，以期家庭教育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家文化；家庭教育；儒家文化；家庭民俗

DOI:10.12417/2982-3846.26.02.040

1 家文化的儒家渊源与本体论建构

要深刻理解中国社会运行逻辑与教育理念，须先回归“家”的本位。中西哲学比较视野下，“家”在两种文化中地位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史两千多年里，追究本原、存在、主客体等，却往往漏掉与人最相关的“家”的哲理，以至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没有家的历史”^[1]。西方倾向追求“逻辑在先”，将人还原为中性感主体，直到晚近现象学思潮中，才将“家”置于生存论视野直面看待。然即便是海德格尔构建的关于“炉灶”与“家基”的诗意栖居，仍乏真实血脉与亲情维系。

相较之下，儒家从一开始便将“家”视为人类生存和德性的绝对源头与本体论基础。儒家视野下的“家”绝非仅是社会学单位，而是活生生、具整全生命体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哲理，特别是《周易》卦象变通中，古人直接进入对“天父地母”和“乾坤生六子”的家化思索，以阴阳互补生生方式深思人生与世界。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等成员围聚于精神与物质双重“炉灶”旁，构成人类最亲密先天经验。人从父母结合获生命，在子宫混蒙之后，于长辈怀抱学会直立与语言，在家人互动中生发出成熟情感、尺度感、关系感与道德感，这正是教育学意义上“人之为人”的起点。

在本体论基础上，“孝”成为理解人性独特的关键。“孝”不仅是外在规范，更是人类“内时间意识”的集中展现^[1]。人类繁衍不同于动物本能，伴随深刻历史感与世代责任感。通过对孝意识的切当体会，可窥见人类如何通过家庭克服时间流逝与生命有限性。个体成年后建立家庭、抚育后代并回馈父母，晚年产生“上不负祖先，下不愧后代”终极意识，获死而无憾的宁静，这种基于“亲亲”的关系循环，使家文化具超越生死的永恒宗教性意义。

从思想演进维度看，家文化核心理念在儒家体系中升华为“仁”。远古时期天地观测催生“生”的思想，西周发展出“德”的观念。孔子在此基础上，将源自东夷等部族呈现二人相亲形态的古字内涵综合，建构了“仁的人性”。仁的重心在处理人际关

系，其核心与出发点正是亲子之爱。由亲子之爱推及家族、国家、天下乃至宇宙万物，形成“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宇宙性仁爱，构成中国型人性基本内容与逻辑结构。因此，家文化的儒家渊源本质是以血缘为基础、以“推己及人”为方法、以天下大同为终极关怀的宏大伦理体系。此种以“亲亲”为本的思想不仅奠定传统社会道德基石，也成为今日家庭教育立德树人的哲学起点。

2 家文化提出的当代意义：“家-国”回应与全球治理

面对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弱化带来的深层危机，重新发掘家文化当代意义，以制度赋能家庭，已成国家政策与全球治理重要议题。家文化不再仅停留在私人领域，而是深融于国家治理体系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核心。

2.1 政策语境下的立德树人与法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标志家庭教育正式从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国事”^[2]，制定该法是为发扬重视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幸福与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同时，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此立法宗旨深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逻辑，彰显家文化在当代国家治理中的战略意义。

在此框架下，当代家文化源于家，生长于家，反哺于家，焕发生生不息的教育与文化生命力。首先，立法强化家庭作为教育起点的责任主体意识。政策要求监护人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责任意识，必须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等全方位教育引导的责任^[2]。这种法律规制不仅对传统家教思想进行时代定位，更让因工作压力和社会流动导致教育缺位的现代家庭得以依法直接纠偏。其次，国家通过社会协同与公共支持体系“补位”家庭功能脆弱性。《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

意见》指出，要发挥家庭教育在少年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3]。现代家庭常面临资源汇集与照料短板，为此国家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应制定专项规划，将指导服务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信息化共享平台提供公共指导^[2]。

此外，政策将优良家风传承转化为社会与个人品德纽带。家风建设不仅限家庭内部，还被纳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文化建设中。国家工作人员被要求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履行教育责任，家庭教育情况被列为文明城市、村镇、家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2]。这充分说明，传统家文化在当代已成凝聚社会共识、提升道德素养的公共文化资本。

2.2 全球治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契合

国际视野中，家庭稳定与繁荣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全球化时代带来经济融合，也伴随贫富分化、社会原子化等全球危机。家庭导向政策对于消除贫穷（SDG1）、确保健康生活（SDG3）、普及优质教育（SDG4）、促进性别平等（SDG5）及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SDG8）具有时代意义^[4]。

应对现代工作与家庭冲突问题上，全球治理理念与中国家文化现代转型形成深刻共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4 明确提出，必须通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社会保护政策，认可并重视家庭内部无偿护理与家务劳动，促进家庭内部责任共担^[4]。全球面临的“照料赤字”问题表明，家庭内部再生产劳动是社会经济系统基础，经合组织（OECD）和北欧国家的政策经验一再证明，完善产假制度、育儿补贴与普惠性托育服务，是支持双职工家庭、提升国家人力资本储备的关键路径^[5]。当传统家族支持网络在全球化与城市化中瓦解时，国家必须通过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与“家庭友好型政策”，提供制度性补偿与福利支持^[6]。

再者，儒家文化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独特东方智慧。当今世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导致社会联结断裂与冷漠。儒家以“亲亲”为本的家文化，倡导“和而不同”“推己及人”，有助于培养群体意识与责任伦理。传统宗法社会虽以家为本位，但注重将血缘道德规范扩展到广阔社会关系中，“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观念，为构建自由、平等、包容现代社会提供深厚价值支撑。在全球文明倡议语境下，儒家“德行伦理”将个人修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联结，倡导互利共赢与文化包容，为解决当代人类认同危机提供了文化启迪。

3 家文化的内涵流变与社会外延

家文化生命力不仅停留在抽象哲学思辨与宏观政策中，更深刻嵌入民间社会的日常实践、教育传承与社会结合的复杂结构之中。理解其内涵与外延，是把握社会运作逻辑的重要切入

点。

3.1 “纵式社会”的伦理内涵与教育实践

中国文化显著特点在于极强继承性，而其核心驱动力正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亲属制度。文化与社会延续性通过“世代之间”交替实现，个体生命意义被置于“光宗耀祖”与“传宗接代”的跨世代链条中。这种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社会，呈现典型“纵式社会”特征，构成社会最基本道德底色^[7]。

历史上，家庭教育始终是维持纵式伦理传承的核心机制。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深刻指出家教特殊优势与矛盾在于“同言而信，信其所亲”，血缘天然信任使家教相较学校教育更具渗透力，却也易致父母溺爱，形成“恣其所欲”。为此，他奠定传统家教宽严相济内涵。北宋司马光《家范》将家文化内涵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提出“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无之”，认为家庭是社会缩影，治家与治国在“礼”规范下具同构性。宋代理学家极大丰富家教哲学内涵，强调早期教育对“气质之性”改造作用，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此外，家文化内涵还包含高度组织化的家族治理智慧。元明时期《郑氏规范》作为历史上最完善家规之一，详定大家族内权力分配、道德宣讲、文化学习与实业劳动，通过“劝惩簿”和祠堂责罚等手段，塑造“孝义”家族气象，展示家文化在维系基层秩序的巨大内聚力。近代面对西学东渐，家文化内涵亦展现强大包容与适应性。晚清思想家在传统家教中引入西方体育、卫生观念及平权、民主教育方式，倡导打破“重男轻女”陋习，使家文化内涵获得新生^[7]。

3.2 家文化的社会外延与拟制性机制

家文化外延展现极强伸缩性与同化力。社会结合基础建立在类别与关系原则之上，儒家“推”的逻辑使家内称谓与情感模式可无限扩展到家外，形塑了诸如“父母官”“子弟兵”“民族大家庭”等深层文化隐喻^[7]。

在传统社会，大量非血缘社会组织（如行会、商帮、结拜兄弟乃至秘密社会）常模拟家庭内在结构与象征秩序建构社会结合，将无血缘个体纳入类似父子、兄弟的权利义务网络。这种拟制性使家族逻辑超越血缘，成为普遍适用的组织模式，极大降低了社会交往的信任成本。

基于此，学界反思“以家族为中心社会难以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观点，构建了“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理论^[7]。该理论指出，家族伦理延续性与纵式关系并非现代化绝对阻碍，相反，它们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现代公民意识产生杂糅与良性互动，成为支撑现代社会信任与整合的本土文化资本。汉人社会的家族结构特点甚至向周边辐射，深远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定居与组织演变；同受儒家影响的东亚国家，在更广阔时空展现了家文化文明渗透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家文化外延还体现

在“范式转移”上。20世纪早期的宏大叙事中，研究常聚焦“国家-民众”二元框架，“家”只是收集民俗资料的工具。而进入21世纪，随个体意识觉醒，研究范式逐渐向“家庭-自我”转移。学者们开始书写“个体民俗志”，将家庭作为理解自我认同、情感网络与文化传承的终极场域^[9]。这种向内审视的转向，表明伴随社会变迁，“家”依然是安顿现代人精神自我的文化锚点。

4 总结

纵观百年流变，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及东亚社会最深层精神底色与结构基石。它承载生命经验与超越个体生死的内时间意识，通过“孝”与“仁”建构，确立人类伦理最高源头；通过传统惯性与拟制机制，构成广袤汉人社会及周边文明结合的强韧纽带，维系“纵式社会”世代传承与身份认同。然而，必须清醒看到，任何文化形态都无法脱离其物质基础与时代环境。近百年现代化转型，无情剥离了传统家庭经济汇集与密集照料网

络。

面对系统性挑战，单纯道德说教与对传统大家庭浪漫化追忆无法挽救现代家庭脆弱性。必须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进行“整体治理”。将家庭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法律手段重塑立德树人家教空间，并通过财政支持与公共服务平台，补位传统家族遗失的支持功能，是国家力量对危机的积极回应。同时，在全球化治理语境下，将儒家强调责任与共同体的伦理智慧，与联合国倡导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深度融合，已成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未来，家文化生命力不在于刻板复原旧有宗法结构，而在于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只有将“推己及人”家国情怀与尊重个体的现代文明融合，用完善的公共政策为家庭分担时代重负，才能在现代社会重新为人类筑牢一个“永远的家”。

参考文献：

- [1] 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N].人民日报,202110-25(013).
- [3]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
- [4] UNICEFOfficeofResearch-Innocenti.(2018).Families,familypolicyandtheSDGs.
- [5] Fukuda,K.(2003).Comparingfamily-friendlypoliciesinJapanandEurope:Areweinthesameorinadifferentleague?JapaneseJournalofPopulation,2(1),2 - 21.
- [6] Chung,H.,&vanderHorst,M.(2022).(Un)deservingofwork-lifebalance?Acrosscountryinvestigationofpeople'sattitudetowardswork-lifebalancearrangementsforparentsandchildfreeemployees.Community,Work&Family,27(3),417 - 441.
- [7] 麻国庆.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8] 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9] 赵李娜.从“国家—民众”到“家庭—自我”:现代中国家庭民俗学之演进轨辙[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52(01): 123-132.